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第二辑

房学嘉
夏远鸣

宋德剑
冷剑波

钟晋兰
著

客家妇女社会与文化

KEJIAFUNDU SHEHUI WU WENHU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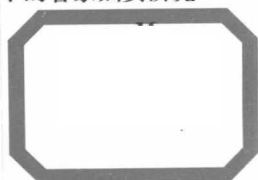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第二辑

-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出版基金项目
- 梅州市人民政府客家研究学术出版基金项目
- 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客家清代古文书研究”成果之一
- 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文献与田野中的客家妇女研究——以粤闽赣边客家大本营为中心”成果之一
- 梅州市妇女联合会项目“客家妇女研究”成果之一



客家妇女社会与文化

房学嘉 宋德剑 钟晋兰 夏远鸣 冷剑波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家妇女社会与文化/房学嘉, 宋德剑, 钟晋兰等著.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4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第二辑)

ISBN 978 - 7 - 5623 - 3558 - 0

I. ①客… II. ①房… ②宋… ③钟… III. ①客家—妇女—
社会生活—研究—中国 ②客家—妇女—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K281.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5490 号

总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营销部电话: 020 - 87113487 22236378 22236185 87111048 (传真)

E-mail: scutc13@scut.edu.cn <http://www.scutpress.com.cn>

策划编辑: 罗月花

责任编辑: 罗月花

技术编辑: 杨小丽

印刷者: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6.875 字数: 212 千

版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第二辑

编委会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钊	叶春生	丘小宏	刘志伟
何星亮	吴庆洲	陈春声	陈伟明
邱国锋	林伦伦	周大鸣	栾 栋
麻国庆	黄志繁		

主 编：房学嘉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宋德剑	冷剑波	肖文评	房学嘉
周云水	钟晋兰	夏远鸣	

总 序

邱国锋

梅州是世界客都，是五千多万客家人的心灵之都，悠久的历史在梅州积淀了浓厚的客家人文资源。梅州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客家围龙屋；也有种类繁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客家方言、客家山歌、广东汉乐等。广东第一才子宋湘、与徐悲鸿齐名的林风眠、现代诗的创始人李金发、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的数学家丘成桐，都是梅州人。梅州人黄遵宪、丘逢甲写的诗歌，被温家宝总理两次引用。近60年来，梅州出了25位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客家民俗在梅州，爱国爱乡在梅州，崇文重教也在梅州。

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是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自2006年成立以来一直得到梅州市委和市政府的全方位关心支持。嘉应学院有一大批研究客家历史文化的专家与学者，20多年来的积淀形成了一个在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研究团队，成绩斐然。从研究成果看，客家研究院在2008—2009年出版了《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第一辑）8卷，论证梅州是世界客家文化之都。在此之前，梅州还出版了客家与梅州书系等。一大批研究成果的问世，充盈了“文化梅州”的浓厚内涵。从服务地方看，客家研究院近年来先后承担梅州市“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相关问题研究”及“客家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研究”等，承办第二届世界客商大会客商论坛，并于2011年11月促成“客商研究院”的诞生。

梅州是重点侨乡之一。梅州三百万客家华侨在海外传播客

邱国锋，嘉应学院院长、教授。

家文化，深深地爱着客家文化，他们是研究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力量和资源。数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客家商人漂洋过海，四处开拓，足迹遍布全球，在各行各业中都涌现出具有开拓进取精神和卓越成就的杰出人物。如“南洋开埠先锋”罗芳伯、叶亚来，新加坡“万金油”大王胡文虎，“领带大王”曾宪梓博士，“人造革大王”田家炳先生，等等。广大客家商人闯荡世界，生生不息，卓有建树，铸就了客家商人乃至全球华商网络的灿烂辉煌。

梅州是一个农业大市，是华南乡村社会的典型区域。显然，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相结合起来的区域是关注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农村问题的理想标本。两三百年来，大批到海外的客家人把海外文化带进来，与本土的原生文化相结合，这样构成的农村与原本的农村意义不一样，烙上了西方文化的印记，许多地方都有西洋与传统风格相结合的建筑。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开展梅州客家文化研究，无疑是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开启了一个新视角。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对完善促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提出了明确要求。传承创新客家优秀传统文化，是加快建设富庶美丽幸福新梅州的内生动力。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第二辑）8卷所涉内容涵盖了客家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凝聚了海内外诸多学者的智慧和汗水，既标志着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正在走向另一个新的高度，也预示着更多的学术人才开始投入客家研究，为“文化梅州”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我们期待着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能够乘势而上，继续出版更多的研究成果，不断挖掘整理客家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丰富“文化梅州”的内涵，为进一步提升梅州的客家文化生产力和竞争力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

是为序！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客家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
第二节 客家历史渊源的基本观点	(6)
第三节 客家妇女研究的意义	(13)
第二章 客家妇女的全息图像	(16)
第一节 客家妇女的服饰	(16)
第二节 外国学者眼中的客家妇女	(21)
第三节 勤劳俭朴的客家妇女	(23)
第四节 聪慧能干的客家妇女	(26)
第五节 贤淑善良的客家妇女	(28)
第六节 刚健果敢的客家妇女	(32)
第三章 客家妇女的生命礼俗	(34)
第一节 诞生仪礼	(34)
第二节 婚嫁仪礼	(36)
第三节 脱离仪式	(43)
第四章 客家妇女的婚姻文化	(50)
第一节 客家妇女的婚姻形态	(50)
第二节 槟榔与客家婚俗	(59)
第三节 客家妇女婚姻形态个案	(65)
第五章 客家妇女的生育文化	(74)
第一节 求子习俗	(74)
第二节 孕期习俗	(76)



第三节 生育习俗	(78)
第六章 客家妇女与信仰文化	(82)
第一节 客家地区的女神信仰	(82)
第二节 客家地区的天后信仰	(94)
第三节 客家妇女在民间宗教中的角色	(104)
第四节 近代西方宗教对客家妇女的影响	(108)
第七章 客家妇女与祖先崇拜	(111)
第一节 隐性的女性祖先崇拜空间	(113)
第二节 宗教神灵中的宗族女神	(118)
第三节 客家女性祖灵崇拜的解释	(125)
第八章 客家妇女的社会地位	(128)
第一节 地方文献中的客家妇女	(128)
第二节 宗法视野下的客家妇女	(148)
第三节 草根文化视野下的客家妇女	(154)
第九章 新旧教育视野下的客家妇女	(159)
第一节 清末的梅州女子教育	(159)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梅州女子教育	(160)
第三节 新中国的梅州女子教育	(165)
第四节 清末民初的客家女教育家	(167)
第五节 梅州的女子体育	(171)
第十章 历史脉络中的客家妇女	(178)
第一节 历史传说中的客家妇女	(178)
第二节 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客家妇女	(181)
附录 客家情歌选录	(184)
参考文献	(200)
后记	(207)



第一章 绪 论

客家文化可以被视为汉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一个缩影。客家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它不仅以汉文化为总体背景，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古代南方各地的区域文化以及当地文化。汉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共同性和丰富性以及该共同体内部不同族群文化的地域性和差异性，在客家文化的总体氛围里，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其影子。对这一具有强烈的个性和典型性的族群进行系统研究，不论是对加深对汉民族共同体的认识，还是对丰富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层次性和历史纵深感认识，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一节 客家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客家学的研究自 19 世纪末发端以来，罗香林是最早对客家民系作系统研究的奠基人，他于 1933 年发表的《客家研究导论》及后续发表的《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篇》等论著，至今仍在影响着学术界。罗氏的民族融合论思想，是对客家学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他反对民族民系所谓“纯粹”的血统论的思想显见于字里行间。他用大量的篇幅、详实的史料所考证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处处体现文化融合、民族融合的轨迹。例如：

汉族乃是混合了无数民族民系的血统而成形的一个住在东亚的民族，她的成形年代，约始于春秋战国的纷争，而完成于秦汉的统一。春秋以前，住在中国内地的民族，复杂至极，就是掌握政权的商周二代，也不是同属一族的人民，其他被此二家统治下的异族，那就更难计数了。

民族民系其血缘的复杂，依吾人客观的态度言之，其本身，实无可疵议；与其说血缘纯粹的民族或民系为足以夸耀，毋宁说血缘复杂的民族或民系为足以激荡其族其系文明的增进；但是，同时亦值得注意相反的事例，任何民族或民系，与其习染其他堕落民族或民系的血缘与恶俗，即毋宁保持自己固有的优性，而使其能为另一方面的发展；所以，血缘与民族民系的文野问题，虽说极有关系，然亦不能遽指她为区别民族民系‘孰文孰野’的标识。这是我们应该牢记着的。

各民系的成形或分化，是互为条件的，是比照而始现形的，是多数并立的，不是单一孤生的。南系汉族，自经唐末五季的迁移分居以后，因分居各分子已能互为条件，比照并立，是而各个民系，便亦因是成形，此种分化的经过，酝酿于隋唐，而完成于宋初。吾人根据此种史实，亦得断定客家民系的成形，始于宋代；这是就历史论据推证出来的事例，除此推证以外，我们亦可从客家的语言文化，以求佐证。

盖从史实观察，所谓华人，根本上就没有‘纯粹’的血统可言，唐宋以前，所谓北系的汉人，很受匈奴、鲜卑、氐羌诸族的混化，浸假而及于五代，这种混化的事例，仍是有加无减；赵宋以后，如辽，如金，如元，如清，那些北部异族，接二连三侵寇中国，深进了汉族腹地，甚者且曾君临中国，或百年，或数百年，始则挟其武力，强迫汉人为臣属，继则陶醉于汉族的文化，有意无意不知不觉间将其族裔的血统，逐渐混入汉族以内，而汉族亦乐得以其同化的潜力，消弭异族残暴的举动，一方面扩大了汉族的范围，一方面混杂了汉族固有的血统，所以名义上，他们虽说仍是中国北部或中部的，然而实际上却老早已是一种混血的民系了；所谓南系汉族呢，李唐以后，越海一系，多与古代吴人越人的苗裔相混，闽海一系，多



与滨居江海的古越遗民相混，南汉一系，多与南越南蛮的遗民及緬族相混，湘赣一系，亦多与南蛮一族相混，虽说混化的程度，有深有浅，或不如北系汉人的厉害，然其非纯粹的汉族，那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客家，虽与外族比较少点混化，然此亦只是少点而已，到底与‘纯粹’有别。

最早述及客家源流变革及语言习俗者当推 1808 年间在广东惠州丰湖书院讲学的徐旭曾，其言后收入《和平徐氏族谱·徐旭曾丰湖杂记》。检视典籍，自徐氏之后，客家研究论著层出不穷，如方言的论著：黄钊的《石窟一征·方言》、温仲和的《嘉应州志·方言》、杨恭恒的《客话本字》、章太炎的《新方言附岭外三州语》、罗蔼其的《客方言》等；历史文化的论著：古直的《客人对》、《客人三先生诗选》、《客人骈文选》，赖际熙的《崇正同人系谱》等，尤以罗香林于 1933 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影响最大。

这一时期的研究实践，学界视野在地域上除注重粤东外，已涉及福建、广西、四川、江西等客家居住地。并出版了不少有关广东地区客家民俗、歌谣、传说的书。值得注意的是，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对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有不少的建树。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不赘述。

1949 至 1980 年间，客家研究在我国内地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态，只有在极少数的语言学著作中偶尔提到客家方言。如 1956 年王力出版的《汉语音韵学》即有“客家话”一节。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学术界也异常活跃，客家问题再次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的重视，成立了一批研究机构，如嘉应大学客家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深圳大学客家研究中心、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客家研究中心、赣南师范学院客家研究中心等，使客家研究得以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创办了一些学术性刊物，作为学者交流的园地，如嘉应大学客家研究院的《客家研究辑刊》、华东师范大学的《客家学研究》、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的《客家大文化》等，其中嘉应大学客家研究院的《客家研究辑刊》半年刊，目前已出版 39 期，被北京、上海

等国内多家大型图书馆及美国斯坦福大学、新加坡国立中文大学等海外高校、科研机构定为中文类核心期刊珍藏。学术界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张卫东主编的《客家研究》第1辑，刘佐泉的《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与《观澜溯源话客家》，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客家民俗》、《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谢重光的《客家源流新探》、《客家形成发展史纲》、《客家文化述论》，杨彦杰的《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王东的《客家学导论》，陈支平的《客家源流新论》，吴永章的《客家传统文化概说》，刘大可的《传统的客家社会与文化》，曾祥委的《田野视角：客家的文化与民性》，罗可群的《广东客家文学史》，刘丽川的《深圳客家研究》，罗勇的《客家赣州》，钟俊昆的《客家文化与文学》以及劳格文主编的《客家传统社会丛书》，房学嘉主编的《客家学丛书》、《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第一辑，谢重光主编的《客家文化丛书》等。而论述客家问题的论文则层出不穷。

嘉应大学客家研究院是深受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客家学研究基地之一。客家研究院除了为从事客家文化研究的人士提供资料性和咨询性服务外，还经常举办讲座、研讨会、学术沙龙、田野工作坊，在大学开设“客家文化导论”等。每两年举办一次客家学术研讨会，其中“客家民俗与客家文化”、“客家在乡商人与地方文化”、“客家文化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对于深化客家学的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先后与法国远东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中央大学”等有关研究机构开展协作交流。其中美国的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以及我国台湾“清华大学”等均有教授到该所作高级访问学者。在研究方法上，田野考察研究法是嘉应大学客家研究院将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法综合应用于客家研究的带创造性的研究方法。从1994年起，嘉应大学客家研究院与法国远东学院劳格文教授合作^①，在

^① 后来加入这一研究计划的还有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韶关学院、赣南师院等。



闽粤赣三地实施细致的田野考察研究，出版了《客家传统文化丛书》系列，其研究方法和成果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台湾，一些高校也先后成立客家学术研究机构，如台湾“中央大学”客家学院、台湾“交通大学”客家学院、联合大学客家研究中心、高雄师范大学客家研究所等。1979年以来，庄英章、陈运栋、尹章义、罗肇锦、钟荣富等学者关于客家研究的成果对学术界影响很大。

香港客家研究始于1847年巴色福音会传教士对新界客家人的观察与访谈，主要成果有艾特的《客家史纲》、黎力基的《客籍华人》等。尔后有赖际熙负责编撰的《崇正同人系谱》。英国人类学家傅里德曼的成名之作《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组织》，使用了很多香港客家资料。美籍人类学者华德英在香港西贡从事水上渔民的研究，其著作有许多涉及客家的论述；英国人类学者贝克对香港新界上水的客家进行了研究，著有《一个中国宗族村：上水》一书。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华人学者参与客家研究的越来越多。如香港中文大学的谢剑长期投入香港惠州客属社团之研究；香港城市大学的艾尔堡所著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中关于客家的参与论述甚详；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康士塔布长期对香港客籍基督徒的研究，等等。

在海外，学术界影响比较大的代表人物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的孔迈隆博士，曾长期从事台湾美浓客家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美国明德大学人类学系的欧爱玲博士，曾长期从事印度塔坝的梅县客家华侨历史的研究；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罗力波（Eriber-to P. Lozada Jr.）博士，曾长期在蕉岭县调查客家传统文化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远东学院院士劳格文（John Lagerwey）博士从1994年以来在粤东北、粤北、闽西、赣南等客家地区主持开展的“客家传统社会的结构与原动力”研究计划，对于抢救民间口碑材料、保存客家民间传统文献、研究客家传统文化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科大卫，长期在香港新界客家乡村从事田野研究，对宗族、村落和社区予以严格的辩论和界定，并认



为农村动力来自具有共同神灵崇拜的社区。

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努力下，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门显学。许多学者表示了空前的学术热情，研究论著层出不穷。1992年秋，谢剑、郑赤琰、劳格文、刘义章等人更是大力倡导，成立了国际客家学会，并先后在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的台北市等地组织召开大型的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客家学研究。在这些国际客家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围绕着客家历史文化特质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讨，而对客家源流的讨论最为引人注目，提出很多新观点。

第二节 客家历史渊源的基本观点

本书的客家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概念。粤闽赣边地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这里山峦重叠，形势险要。生活在这片山地的人，基本上自我认同是客家人，虽有部分人没有认同，但也同操客家方言。客家先民，在这片生产生活条件极端恶劣的环境中，披荆斩棘，繁衍生息，筚路蓝缕，创造了灿烂的客家文化，培育了无数英才，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演出了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因而引起了世人瞩目。客家族群人口众多，学术界估计有四五千万。所谓族群，韦伯（Max Weber）的定义是：如果那些人类的群体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或者是因为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是因为对移民的历史有共同的记忆，而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种群体就被称为族群。也就是说，只要成员对他们的历史、或祖先、或来源、或神话传说、或重要事件（不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或语言抱有一致的认同，他们就结成族群。

客家文化是客家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客家人及其文化。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参见



《辞海》)。关于“文化”的定义,泰勒(Tylor)在其1871年的《原始文化》中是这样下的:“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庄锡昌,1987)。本书中所指及的“客家文化”之“文化”一义的解释与上述解释基本类似,只是它的表述更具体更全面些,如方言、围龙屋、民间信仰等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知识、风俗习惯等。当然不是泛泛而论,而是限定在大家最切身也是最关注的客家范围内。

在“客家学”的研究历史中,对客家源流的探讨一直都在无形地制约着客家文化的研究。客家源流问题虽已是“客家学”研究中的永恒话题,但事实上,学术界始终都未形成一个共识而莫衷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一些学者撰文讨论客家历史源流,如李默的《论客家的形成及民族融合》(李默,1994)、许怀林的《关于客家源流与客家民系的几个问题的论争》、《关于客家源流的再认识》(许怀林,1994、1995)等。专著如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房学嘉,1994)等,对自罗香林以来关于客家源流“南迁说”提出质疑。“南迁说”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根据对史料记载的理论论证与民间谱牒的逻辑推理,带有一定的假定性。这种带有一定假定性的客家源流“南迁说”持定“客家先民自中原迁居南方……其先世,则多居于黄河流域以南,长江流域以北,淮河流域以西,汉水流域以东等,即所谓中原旧地”(罗香林,1989),自然而然地,中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便成了客家文化的母体文化,成了客家文化研究的一个大文化背景。实际上,“客家先民”南迁始于何时,前后共有多少次,南迁的路线怎样,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新论迭出,这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南迁说”的根深蒂固与深远影响。

当前学术界关于客家源流的讨论可归纳为:“北方汉人主体说”与“南方汉人主体说”。中国汉民族分布地域辽阔,南北文化

存在一定的差异，学术界据此将汉人分为南北汉人，其中古百越地区自秦汉归属帝国的版图后，百越民族大部分已认同于汉成了南方汉人。

“北方汉人主体说”是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主要观点，在学术界影响甚大。罗氏对客家历史源流的研究不但有开创之功，且对客家人上自五胡乱华以来的五次大迁移说及相对纯正汉人血统^①等主要论点被客家论者普遍接受。关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罗氏在其论著中，一直强调各民族之间互相融合，文化相互影响。但当论述到客家族群的源流时，则强调客家的特殊性，强调客家人的祖先是从中原迁来的，如“‘客家’是‘客而家焉’的意思，顾名思义，当知其非中国南部固有的民系”。“客家是自北南徙的民系”。关于客家共同体的血缘问题，目前虽无量化的科学数据可供参考，仅凭推测过分强调并无必要，但只要讲客家源流却又难以回避。关乎此，罗氏认为，汉人有南北之分，即“北系汉人”、“南系汉族”或“南汉一系”。“至于客家，虽与外族比较少点混化，然此亦只是少点而已，到底与‘纯粹’有别”。他在引用 Huntington（韩廷敦）的话谓：“客家人是十分纯粹的华人，他们可以说，完全没有和外族的血统发生过混合。”在阐述客家民性的形成时进一步指出：“客家民系最富爱国保族的思想，这因他们先人，昔年，曾受北部异族，强烈压迫，向南迁徙，非由己愿；当其辗转达到大江南北岸时候，已不知经了几多流离，几多颠顿，而后九死一生，幸存着一部分系裔，追怀往痛，旧恨难消，父以传子，子以传孙，一种嫉愤外族的情怀，遂致历久不释，这许就是他们民族思想来源罢！”

检视学界关于阐释客家“北方汉人主体说”的论著林林总总。论者普遍认为，客家人以汉族为主体，长期与古百越族的支系畬、瑶、苗、疍等族特别是畬族通婚和血缘交融。论者认为，客家本来就是生活在北方的“土著”居民，是汉族中的一支族群“司豫流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台北：南天书局，1992：第63-76页。



人”。在漫长的往南迁移过程中与百越诸族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和互相融合，有的转化为汉民族的其他族群或其他民族的成员，有的则在交流过程中影响了别的族群或民族的居民，保留了客家的本色，即今日的客家人。根据这种论点，除了强调客家族群以汉族为主体以外，似乎认为是客家人南迁而不是中原汉人南迁并与其他民族融化形成客家族群。

“南方汉人主体说”^①。据考古提供的信息，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无论是中原还是在粤闽赣三角地区，无论是在北方的黑龙江还是在南方的海南岛，无论是在东海之滨还是在云贵川，都有比较精美细致的石器工具，都有形状差不多，甚至极为相似的彩陶器皿，这些生产和生活物质的出现，当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共生现象。房学嘉的《客家源流探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田野经验提出了客家源流“南方汉人主体说”。

虽然有关客家的历史源流众说纷纭，但客家族群是汉民族中一个系统分明而很有特色的支系是肯定的。学界诸说都强调客家先民有相当一部分是古代居住于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的汉人。汉人南迁，有史料记载者始于秦代，但不是所有南迁的汉人都是客家族群的先民，它还包括了广府、福佬等族群的先民。汉人南迁比较大规模的是始于汉末至东晋，当时主要是受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和东晋永嘉之乱影响，而迁移至长江流域的洞庭湖、鄱阳湖和太湖三大区域。从东晋至五代，受安史之乱八年、黄巢之乱十几年和五代纷争

^① 叶智彰在《客家民系本质的自然科学证据》（见《客家研究辑刊》1997年第1期）中指出：人类有共同的祖先，群体扩散以后由于地理隔离等生殖隔离因素，各群体间缺乏基因交换而产生了遗传距离，进而产生了不同的人种和族群，族群间由于缺乏交流而产生了语言文化差异，即趋异现象。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有历史记载以来，一反史前的趋异现象而走向趋同，各族间加速融合。就中华民族而言，北方汉人加速与北方少数民族融合；南方汉人加速与南方少数民族融合。上述遗传距离的南北界线就是这一观点的自然科学证据。客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就是这一观点的实例。是中原汉人南迁而不是客家人南迁。南迁的中原汉人与古百越族的支系主要是畬族融合形成了客家民系，且畬族不占少数。如果认为畬族占少数的话，就无法解释上述遗传距离研究的南北界线。